

● 书 评

关于自由的忧思

——评《自由的表演与魅力》

卢 风

(清华大学 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0)

[作者简介] 卢 风(1956-), 男, 安徽六安人,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 哲学博士,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中心副主任, 主要从事伦理学、现代西方哲学和科技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 B82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3)05-0634-02

读友人吴根友教授的新著《自由的表演与魅力》, 仿佛又回到了在武汉大学枫园朝夕相处的岁月。记得从1989年9月入学一直到1991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 我们都处于极度的沉闷和痛苦之中。我曾于极度痛苦中写了一篇文章, 题为《“内圣外王之道”与社会主义民主》, 表达了对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关怀和对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利于民主生长的观点的检讨。那时我们的关怀是很一致的, 都殷殷地期盼中国能早早踏入政治改革的坦途。至今, 十几年过去了, 读吴君的新著, 觉得我们思想的兴奋点已有较大的不同。

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状况渐入佳境。当中国共产党正式拥抱市场经济之后, 我便认定中国政治民主化的势头已不可逆转。我认为文化是有其内在结构的有机整体。如果我们不考察人与非人动物之间的区别, 而只考察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 即可撇开语言而将广义的文化分为6个层面: (1)器物; (2)技术; (3)制度; (4)风俗习惯; (5)艺术; (6)信仰或理念。这6个层面总处于互动的关系之中。我们党追求现代化, 但拒斥资本主义。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我们认同西方文化器物和技术层面的一切, 即认同工业化, 但拒斥西方的制度、风俗习惯、艺术以及理念。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 我们除了器物和技术而外, 还认同了制度层面的市场经济制度, 这便从根本上为政治民主化奠定了基础。道理似乎很简单, 当一个政权真的把经济放在首位, 而不是把政治和道德放在首位时, 它便再也不能奉行愚民政策了。在知识经济时代, 它必须激励人们学习科学技术, 必须使人们聪明起来。统治聪明人的最佳方式就是民主法治, 而不是人治, 因为聪明人不像朴实人那样崇拜、敬畏统治者。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社会就是一个人人用智逐利的竞技场, 维系这个竞技场的秩序只能诉诸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制和监督, 而不能诉诸至高无上的权威, 也不能诉诸人们的普遍觉悟。归根结底, 只能诉诸法治(the rule of law), 而法治又必须与民主相结合。可见, 有这样一个“逻辑程式”: 市场经济——法制(界定市场秩序)——法治与民主(使法制生效), 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势必引出法治化的民主, 制度层面的改变势必引起风俗习惯、艺术和理念诸层面的改变。经过这样的改变, 中国文化仍可保留自己的某些独特风格, 但在总体上摆脱不了西方现代性的模铸。

基于以上认识, 我认为中国政治走向法治化民主只是迟早的事情, 需要的只是政治家的推动, 而不是思想家的沉思。吴君一定不赞成我的观点, 他仍一直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而沉思。他一直渴望真正的自由, 但“看了自由在中国历史上的匆匆表演”, 他“心中的悲情常常无法排遣”(《自由的表演和魅力》, 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 第147页, 下引只注页码)。吴君多年研究中国哲学史, 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识比我深刻得多, 读吴君的书, 我开始怀疑自己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是否太乐观了。

吴君的书纵论古今, 取材广泛。述刘兰芝、焦仲卿们追求爱情自由催人泪下, 讲黄宗羲、严复等针砭传统弊端令人叫绝。在历述前人和他人的自由观之后, 力陈自己对自由的独特理解, 忧思中仍透出对未来的热切期盼。

吴君认为，“自由不是先于人类而生长的森林野果”，而是“人类用生命的汗水与鲜血浇灌出的”美丽花朵。自由虽不是人类追求的惟一价值，“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价值”，“一个自由资源匮乏的民族，一定是一个僵化自封的民族”，“惟有自由，自由的思想，自由的创造，自由的竞争，才会有自强不息的生命之流”（第147—148页）。中国传统思想不可谓不博大精深，但自由思想却匮乏得很，如严复所言，“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第148页）。国人“有充当阉宦的自由，有阉割自己正常人性的自由，……也有使自己成为圣贤的自由，但……绝没有使自己成为独特的‘这一个人’的自由”（同上）。国人缺乏勇于做独特个人的个性，缺乏自由的真精神。那么，什么是自由的真精神呢？

吴君认为，“自由是一个人理性成熟状态的标志”，而绝不是任性胡为，不是满足一己之私。“自由首先是人道的”，如殷海光所说的，自由的伦理基础是“把人当人看”（第156页）。自由不是对一切规范的蔑视，相反，“一切自由都必须以规范为前提”（第165页）。依吴君之见，自由有其边界。但自由的边界不是对自由的简单遏制，“而是一种引导，一种升华，是人提升自己的人性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第165页）。从社会角度看，“自由首先是对社会公认准则之遵守；但从人道的角度看，从人的理想来说，实现社会中每个具体个人的自由才是人类的奋斗目标。社会规则都是为人的更大的自由服务的”（第157页）。在此，吴君似乎设定自由就是人类追求的最高目标，而社会规范只是服务于人类追求自由、享受自由的手段。

在吴君看来，自由“是人的理性与良知在社会公共生活中的公开运用，是个人对自己从而也是对社会负责的理性行为。从道德的角度来说，不食嗟来之食是自由，不从狗洞里爬出来寻求活命是自由，不受自然的兽性的蛊惑是自由。从法权的角度来说，说自己想说的而不受任何威胁是自由，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而不受任何胁迫亦是自由”（第164页）。可见，个人自由的先决条件是理性成熟，一个理性成熟的个人的自由包含三个方面：（1）自立，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食嗟来之食”，不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不求他人解决自己的困难；（2）自尊，认为自己有某种绝对不可剥夺的尊严，“不从狗洞里爬出来寻求活命”，努力自我超越，“不受自然的兽性的蛊惑”；（3）自主，对自我利益以及社会利益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解，不盲从，“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不做自己不想做的事”。理性成熟者的自立、自尊与自主，大约就是吴君所说的“自由之精义”，它是伯林所说的“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统一”（第165页）。

吴君一半赞成胡适的观点，认为“自由的气度是宽容”（第164页），但吴君深知在实际生活中“有权者从来不宽容无权者”（此言有些偏激），故认为倡导宽容还不如强调对权力的制衡（第123页）。出于对专制的憎恨，吴君厉声申言“绝不宽容专制”（第164页）。但吴君深知仅有少数人的思想表达并不能使国人享有真正的自由，自由必须有法律制度的保证，故大声疾呼，“要建立起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经济和法律一体化的制度体系”（第168页）。

吴君为自由呐喊，即为中国之现代化呐喊，即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呐喊。前几年，有一位社会学教授说，再过几年，中国即可宣称实现了现代化。但吴君要我们“冷静地问一声，我们的国家现代化了没有？我们的民族意识现代化了没有”（第167-168页）？吴君也研究社会学，但远没有那位社会学教授乐观。让吴君深怀忧虑的是，我们的文化、道德建设并不重视国民的“个性化”培育。吴君认为，不在这种“现代人文精神”的基调下谈科教兴国和创新意识，那么我们即使拥有发达的硬件技术，也不能保证我们民族的经久不衰（第168页）。可见，吴君认为，必须有人的现代化（即理性成熟的个性化），才有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

读吴君的书，仿佛又在与吴君促膝交谈，能听到他深深的哀叹，能感受他批判的激情。反观自己，觉得已失去昔日的激情，已淡漠了对自由民主的关切。我觉得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国人在贪欲的推动下，于非理性的自由中创造了经济繁荣，经过后来的逐步规整，中国已踏上现代化的坦途。读完吴君的书，不觉减了几分乐观，添了几分忧愁。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对西方现代性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不认为现代化是我们的终极目标。但我深知，中国必须走完自己的现代化历程，才能走向更高的目标。中国有五千年文明历史，中国文化传统无疑可对现代文明之后的文明有深刻的启示。但中国传统文化却是现代化的沉重包袱。日本没有自己的原创性文化传统，故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如何清理传统文化，使之实现创造性转型，以尽快走完现代化历程，确实是我们极其重要的任务。吴君自觉担当此任，是真勇者也。

（责任编辑 严 真）